

你见过大海

当代陕西先锋诗选

1978—2008

民间 ■ 先锋 ■ 实力 ■ 历史

沈奇 主编
杜迂 编选



西北大学出版社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你见过大海

当代陕西先锋诗歌选
(1978—2008)

民间 / 先锋 / 实力 / 历史

沈奇 主编
杜迁 编选



西北大学出版社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见过大海:当代陕西先锋诗选 / 沈奇主编.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5604-2628-0

I. 你… II. 沈…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7671 号

你见过大海——当代陕西先锋诗选

作 者 沈 奇 主 编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 邮编:710069)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艺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32 开 8.5 印张

字 数 194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4-2628-0

定 价 25.00 元

民间 / 先锋 / 实力 / 历史

回看云起时

——《当代陕西先锋诗选》序

■ 沈 奇

—

编选一部“当代陕西先锋诗选”，是我蓄之多年的心愿，也多年在心里反反复复地酝酿，乃至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跨越新世纪的这十年，回首30年的路程，按照伊沙的说法，我们这些坚持在这个曾经辉煌的诗歌帝都从事纯正诗歌写作和诗歌活动者，都是这座诗城的“守望者”。这一不免有些悲壮而苍凉的自嘲，可以说，凝聚了几代陕西先锋诗人的心路历程，也时时激励着包括从这里走出去而成名于他处且时时回望难舍的众多诗友。如今，在我的学生、青年诗人杜迁的协助和诗友们的支持下，以1978至2008为时间段的这部《你见过大海——当代陕西先锋诗选》终于艰难结集，付梓在即，作为其始终的酝酿者和催生者，实在有太多的话想说而又不免感慨万千。

当然，首先得以主编的身份，向诗界和这部书问世后可能的读者，作一点有关此书编选的基本理念、大体框架及入选诗人的概要说明。

先解释书名。

所谓“当代”，自是指“文革”结束后乍暖还寒的上世纪70年代末到新世纪这八年，恰好应合了作为社会学概念的“改革开放30年”。集中所选作品，也大体以这30年的创作为限，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

所谓“陕西”，在这部诗选中有两层指向：其一，属陕西籍并一直活跃于本省诗歌界的诗人；其二，虽非陕西籍，但其诗歌写作是由陕西起步并成熟且成名于斯时斯地的诗人，尤其是以其创作成就和创作风格，曾经影响到当代陕西诗歌发展并构成其实质性的内在理路者，包括具有重要作用并成为深度推动力而薪火相传的校园诗人——作为在中国名列前茅的高校所在地，活跃于西安诸多大学的校园诗歌，一直是这座诗城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和希望之所在。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先锋”的冠名。对此我曾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留下了这个似乎已然过时且不免有些暧昧的称谓。坦白地讲，若依照纯粹诗学或美学层面的“先锋”概念而言，本诗选中大概有半数的人选诗人和入选作品都与“先锋”无关，有的甚至可能还有相悖之嫌。但是，其一，这30年在陕西诗歌版图上发生过的、真正称得上“先锋”的诗人和其作品，大体已尽收于此集中，不负其名；其二，本诗选更深一层的“先锋”意思，是可称之为“诗歌社会学”意义上的“先锋”。具体而言，是指在这30年陕西纯正诗歌写作进程中，于诗歌精神、诗人人格、诗歌立场、诗歌风格等，在包括现代主义、现实主义、

浪漫主义、以及新古典主义等各个路向的发展之关节点上,都多少起到了或开启、或推动、或表率作用的诗人及其创作与活动。

由此进而标举出“民间”、“先锋”、“实力”、“历史”这四个理念,作为本书编选的基本思路。

这里的“民间”,是指一种诗歌立场,而非诗人实际的社会身份。让诗歌回到民间,与当代中国人真实的生存体验、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和谐共生,以重建现代诗歌精神,并彻底告别官方诗坛一花独放的旧格局,以自由、自在、自我驱动与自我完善的民间化机制,开辟现代汉诗的新天地,是上世纪波澜壮阔的中国先锋诗歌运动为我们留下的一笔至为重要的精神遗产。具体于当代陕西诗歌发展而言,本书所标举的“民间”,主要是指那些从一开始就摆脱或逐渐疏离于官方主流诗歌意识的困扰,试图以独立个在的诗歌人格与诗歌风格开辟新的诗歌道路,并由此拓展长期被单一化的诗歌生存状态的诗人 and 他们的创造性成就,从而使当代陕西诗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与生机——这对于文学观念相对比较封闭和陈旧的陕西来说,实在是一个十分艰难而来之不易的历史性转换。正是因了这些诗人和他们的作品的存在,当代陕西诗歌的发展,才算有了足以和整个 30 年间空前高涨的中国现代主义新诗潮堪可比肩而行的“实力”,并成为这一历史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列方阵。

这一方阵的形成过程,大致梳理下来,可分为八个阶段,并由此构成本选集的八个小板块。严格说来,各个阶段和各个板块之间,并没有十分紧密的因陈关系,且大多呈现为一种交叉互动的松散状态,但其内在发展理路,确实有着一脉隐在的精神关联,成为这一方阵赖以形成与发展

的深度推动力,也成为其共有的历史印记。

二

本诗选结集开篇,即以年逾八十的老诗人沙陵和已故诗人胡宽为第一单元,有其特殊的意义。

作为陕西老一辈当代诗人中的代表人物,沙陵的存在及其对陕西近 30 年来诗歌发展的影响,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毋庸讳言,作为个人诗歌创作的诗人沙陵,其作品本身虽不乏个在风格和探索精神,但始终未能实现现代性的根本转换,而真正抵达他所抱负而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然而,作为贯穿当代陕西诗歌全历程的灵魂人物,这位跨越两个世纪的诗歌老人,确然如一棵历尽沧桑不变色的常青树,感动并激励着几代陕西诗人,并以其资深诗歌编辑始终如一的明锐慧眼与艺术良知,在这片远比其他诗歌板块更为板结与苦涩的区域里,扮演着探索者、实验者和提问者的中心角色之一,如苦行僧一般,义无反顾地一路泼洒着他的虔敬与爱心——至少在西北这块诗歌版图上,沙陵的诗路历程,已成为一种精神的感召:如此的真诚、执著、纯粹,使所有认识沙陵的人们,重新理解到何谓真正意义上的“生命写作”。而即或是在他未臻理想境地的诗歌创作中,也不难发现,无论是长诗还是短诗,是咏物,还是抒怀,都始终贯穿着一种对生活与艺术的思考与理解的传达,使诗行中充满了特有的沧桑感和思辨色彩。可以说,至少在所谓“哲理诗”这一路数方面,沙陵将沿袭甚久影响广大乃至成为积弊的“社会哲理诗”转换为“生命哲理诗”,无疑已是一个质的跨越。由于特殊的历史境遇,岁月将沙陵分解为两种诗性角色:作为职业依附的诗歌工作者和作

为生命归所的诗歌创作者。前者，真诚到永远；后者，探索到白头。二者合一，造就了一位对当代陕西诗歌有着双重贡献的诗歌老人。这位诗歌老人在体制内生活工作了一生，但其诗歌意识却从来都是个在而民间性质的，这也是他之所以为几代陕西诗人所尊重并引为精神导师的根本所在。

作为真正意义上的陕西先锋诗歌写作，胡宽可谓第一人，有“陕西的食指”之称。身为“七月派”代表诗人胡征的儿子，胡宽一直生活在父亲因受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而遭受各种迫害的历史阴影里，且因从小得了“哮喘病”并纠缠其一生而早早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这一病症实际上成了胡宽诗性生命的一个“隐喻”，并决定了他始终是一个被命运扼住喉咙而难得自由呼吸，却又要力图扼住命运的喉咙并用自由的灵魂来呼吸和呐喊以反抗命运的诗人，同时也决定了他所有的反抗都只限于对自我的拯救而难得率众而行。正如批评家张柠在《我们内心的土拨鼠》（原载《作家》文学月刊 1999 年第 12 期）一文中所指认的，这是一位“把自己作为一名‘英雄’从人群中分离出来”，“野心勃勃”地勤奋写作并满怀傲岸气质的诗人。韩东则指出在那样一种完全封闭的写作状态下，胡宽的诗歌品质可以和食指、北岛、多多相媲美，而且会在新的世纪里得到更多人的热爱和尊重。除了和身边有限的几位非主流非体制性的青年艺术家交流之外，胡宽生前既很少和诗人们来往，又不公开发表作品，但他特立独行的精神气质和领风气之先的先锋意识，依然如“地火的运行”，开启了陕西先锋诗歌的先声，并潜在性地影响到后来的先锋诗人写作，成为出自陕西本土的先锋诗歌精神的源头，同时也使得他个人的创作成就，获得和早期北京“今天”派诗人的探求不

差上下的历史意义而为历史所记取。本诗选选编胡宽三首短诗力作和两部长诗代表作《雪花飘舞》、《土拨鼠》，其中《土拨鼠》一诗因本书篇幅有限只作存目备阅，特此说明。

诗选“辑二”，选韩东、丁当、杜爱民三位诗人的作品，也是陕西先锋诗歌 30 年最具代表性的重要收获。

拉韩东作当代陕西先锋诗歌的代表，似有“拉大旗作虎皮”的嫌疑，但韩东这杆大旗又确实是在陕西这块诗歌版图上最早树起来的，且由此而直接开启了陕西先锋诗歌之真正意义上的发生与发展，并内化为灵魂与血液性的存在。韩东 1982 年秋由山东大学哲学系毕业分配至陕西财经学院工作，与西安的杨争光、徐烨、丁当、沈奇和尚在陕财就读的杜爱民等诗人认识，并很快成为其灵魂人物。此后近三年间，韩东在西安写出了他最具代表性的早期力作，如《有关大雁塔》、《我们的朋友》等，同时创办民间诗刊《老家》和进行他的诗歌观念的“布道”活动，一时风生水起，为陕西诗歌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并延为传统，一直影响到 80 年代末回陕的伊沙等人。仅就韩东而言，在陕西的这段诗歌历程，实际上是一次双向的开启，本诗选只是想客观还原其历史的真实而已。

丁当最初和与他同班的大学好友沈奇为伍，并一起创办民间诗刊《星路》，结识韩东后，按丁当自己的感言，才算找到了符合自己本源性诗歌理念的“组织”，可谓一拍即合而一发不可收拾。丁当的价值在于，他并没有成为韩东诗歌观念和其写作方式的投影与仿制，而是有机地保留了他个在的生命体验与语感机制，即于韩东式的口语与叙述语式中，十分机智而恰切地融入了他独特而具有原创性的意象元素，成为独出一门的天才创造，也成为韩东“西行播火”之最为经典的结果。在丁当身上，彻底的虚无主义和清

醒的现实主义奇妙地合为一个极富现代意识的主体精神，从而将偶在与宿命、理想与现实的悖谬揭示与演绎得出神入化，极富穿透力，至今难有人望其项背。后来韩东调回南京工作，依然不忘知己，拉丁当一起创办《他们》，而丁当更是将《他们》视为唯一的文学殿堂，只“为《他们》而写作”（丁当语），显示出彻底的民间立场，在诗坛传为佳话。

杜爱民大学期间开始写诗，恰逢韩东在他就读的陕西财经学院教书，使其原本相近的诗歌追求很快得以确认而免生徘徊，也算难得的机缘。杜爱民真正的成熟，是1983年大学毕业分配到西北师范大学任教后，将受韩东影响所确立的诗歌理念有机地化入对“西部精神”的独到理解，以原生态的生存体验、原发性生命体验和原创性的语言体验，写出了一批冷峻而隽永的精品力作，对滥觞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所谓“西部诗歌”之“泛意识形态化”和“泛文化明信片”式的空洞表现，予以纠偏取正，获得极大反响。这期间，杜爱民还经沙陵介绍和沈奇推荐，认识著名“七月派”老诗人牛汉，在其主编的《中国》文学杂志（后停刊）连续发表诗作，成为当时被牛汉命名为“新生代诗人”群体的佼佼者。80年代末复回返西安工作后，改以散文创作为重，淡出诗歌界，但手中的那支诗笔一直默然而动，时有所得，品质依然不逊当年。

诗选“辑三”，汇集沈奇、渭水、李汉荣、秦巴子、孙谦五位诗人为一单元。此组诗人风格迥异，各个不同，但其共有的价值属性在于：其一，都是长期坚持在陕西本土创作并影响及全国乃至海外的诗人；其二，都在各自所认定的创作路向上做出了创造性的探求，并有精品力作行世而成为其创作路向在陕西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其三，一以贯之的个人化风格和民间性立场。

集诗人与诗歌活动家为一身的渭水，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陕西诗坛独树一帜，影响甚大。不可否认，作为诗歌文本的渭水，一直存在着缺乏明确的方向感和深入时间的经典之作的缺憾，但其在由政治抒情诗向社会抒情诗的艰难转向中，依然不乏个在的探求而成就非凡。其中，两部长诗力作《1986：阿兹特克世界大战场》和《水的哭泣——献给世界“地球日”20 周年暨新世纪的开拓者》及组诗《面世》，都是此一路向中让人难忘的重要作品。这是位永远以年轻的心态拥抱生命和时代的歌者，尤其是对诗歌事业的热情投入，更是让人难以忘怀——作为诗歌活动家的渭水，早在 1984 年就主持编辑印行了中国最早的民间诗歌丛书《长安诗家》十人集，随后又于 1985 年再次编印包括杨炼、王家新、岛子等在内的《中国当代青年诗人》丛书。熟悉当代中国诗歌历史的人们都不难想到，这样的举措在当年的诗歌生态环境中，要承担怎样的风险，其彰显的诗歌精神和民间立场理应为我们长久铭记。

李汉荣是我的同乡老友，多少年来，我一直为自己有着这样一位乡友诗人而自豪，同时也一直认为他的存在无疑是我们陕西诗歌界的骄傲——先后入选由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由张默、萧萧主编的《新诗三百首》（台湾九歌出版社）、由谭五昌主编的《中国新诗三百首》等海内外重要选本，其骄人的声誉早已超越他所寄身的陕西诗坛。诚然，汉荣的诗从来就与“先锋”无干，他是从另一个源头出发并坚持走自己道路的诗人，是我所称之为“现代浪漫主义”和“常态写作”在陕西乃至海内外的典型个案。在告别浪漫的时代里守望浪漫，在消解深度的时代承载深度，在想象力贫乏的时代显示他超人的想象，以抒情长诗《献给珠穆朗玛峰》为代表的诸多

重要而又优秀的作品，充分显示出其音色的纯正和意境的高远，并一直不乏热爱他的读者，也便一再证明他的固执与守旧，照样在多变的时代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以常态而先行，以实力而改写历史，浮躁而多变的时代，需要这样的诗人来稳住必要的阵脚。

作为陕西实力诗人的另一领军人物，秦巴子的诗歌写作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影响广大而持久。巴子的诗歌历程如一条水静流深的长河，没有故作姿态的掀波弄潮，却汹涌着内在的智慧与力量。其诗思广披博及，其技艺精湛隽永，经得起苛刻眼光的挑剔和时间的汰选。尤其是对社会与人生的明锐观察和精微透析，和融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为一体的诗性思维，构成其不同凡响的高超品质。从早年主编《西部诗报》开始，巴子就确立了他毫不动摇的民间诗歌立场，并将这种立场带入到他绵延近 30 年的写作历程中。更为诗界所称道的是，即或在体制外写作语境中，巴子也一向特立独行，本色行走，不入圈子不跟风，在在显示出其纯正而真诚的艺术风范。

“隐者诗人”孙谦，是陕西诗坛的一个“异数”。算起来，我与孙谦的诗歌交往已有十多年，其间还应邀为他在台湾出版的诗集《风骨之书》写过一篇很得意的序文，但至今我们未见过面。一个你熟悉其文本的诗人，总是像一座隐在远处的雕像般沉沉地存在着，不与你作正面的交流，实在是令人莫测高深。当然，就一部诗歌史来说，文本的存在是最根本的存在，一部《风骨之书》，已足以奠定孙谦无以替代的历史席位。《风骨之书》中的组诗《魏晋风骨》，曾获 1992 年台湾《蓝星》诗刊举办的首届“屈原诗奖”，从而使当代新古典一路的诗风，有了一个可资参照的新坐标，也填补了陕西诗歌的空白——仅就这一路向而言，孙谦既是

先行者，又是集大成者。多年的边缘行走使孙谦成为“在时代最暗处发光”的诗人，写作对这样的诗人而言，早已不再仅仅是诗意的亲近或诗艺的修为，而“只是一种保持生命本色的努力”，“一种改换生命的方式”，并由此“烛照一层特异的生存意蕴”（孙谦语）。

身为本诗选的主编而忝列入选，使我不宜在此再作自我评价。作为诗写与诗评双栖的诗人，不免屡屡遭遇这样的尴尬——我自认不是多么优秀的诗人，但也不是不知道诗何以才能优秀而能潜心寻求且不乏偶得的诗人，加上耐得住寂寞和持之长途跋涉的脚力，总还是拥有了杂糅并举的综合风格和不断成长的精神历程。这里不妨借诗评家陈超的评语小作总结：“沈奇的诗，有自己独特的情感背景。他诚朴而自明，不是寻新求异匆匆披挂，而是在透明的语境中，寄寓深永的历史叹息，将‘暴戾的岁月，转化为细语的音乐，一种象征。’（博尔赫斯·《诗艺》）他的写作准则是：仁慈、明净、诚朴、适度以及形式主义的快乐。”（陈超：《清峭心曲诚朴诗》，见沈奇诗集《淡季》附录文之一，香港高格出版社 2003 年版）

诗选“辑四”，汇集当代陕西诗歌进程中第一波高海拔崛起的大学校园诗人之代表人物唐欣、马永波、杨于军、仝晓锋、王建民五人作品。这五位诗人的创作，大体都成熟并活跃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其影响从当时的西安校园到后来的全国各地，是继韩东、丁当、杜爱民之后，再次由校园崛起的先锋诗歌浪潮，也是被称之为当代中国“第三代诗人”群体中的陕西代表之主要部分。如今五位诗人几乎都已脱离陕西本土，但那段浪潮进涌的壮观景象，至今令陕西诗歌界难以忘怀，并构成了陕西诗歌发展中无可替代的一段重要历程。

客观而言,唐欣主要应归属于甘肃诗人队列。但作为西安籍的唐欣,在其文化地缘情结上却一直与陕西藕断丝连,双栖并重,至少算是半个陕西诗人。尤其在西安攻读硕士其间及其后,与陕西的伊沙、沈奇、秦巴子等诗人来往密切,并参与其各种诗歌活动,在陕影响不小。唐欣为诗,一言而蔽之:笔随心曲,本真呈现,从容而老到。尤其善于由普泛人生和世俗生活中发掘天籁之音、童心之趣,寓庄于谐,别具一格,尤其是对口语的合理运用和对叙述性语式的天才发挥,几已至炉火纯青的地步,可谓不显山不显水而独辟蹊径的“慢先锋”。身为文学博士而心依民间情怀,不端不妄,尽弃矫饰,风骨迥然。近年调转北京京城教书,接连几批新作问世,更是宝刀未老,为诗界所瞩目。

马永波 1982 年由黑龙江考入西安交通大学后,很快在这所不乏人文环境的名校中成为校园诗歌的风云人物,也是该校近 30 年来最早驰誉于国内外的成名诗人。当时的交大诗风很盛,可谓风云际会。来自北中国的马永波以他早熟的心智、娴熟的技艺、清冽的气息、沉郁而帅气的抒情格调,以及深厚的翻译诗歌的背景,赢得校园内外的广泛关注,是那个时期陕西先锋诗歌进程中一个特别醒目的印记。从收入本诗选的两首早期作品《秋天,我会疲倦》、《寒冷的冬夜独自去看一场苏联电影》可见其风格所在。如今永波已名重天下,著作甚丰,但我们依然怀念他早期的那一脉如白桦林般清纯而优雅的诗风。

同样来自北中国的杨于军,赶上了西安交大第一波诗歌风云的尾声阶段,并成为这一阶段的绝响。在八十年代中期的陕西诗界,没有谁能像杨于军那样,以一名名不见经传的校园诗人而迅速成为一颗光耀东西南北的新星。虽然她不久就长期离开了诗歌界,但近年复出后,风骨依旧

不减当年。比较大多数女性诗人而言,她的诗格外是本能的,表现了她天性深处的东西,保持了她自己对生命、自然和世界独特的感悟,和由此产生的独立的诗情。她的日记式的、毫无功利性的创作,给她的诗带来一种特有的宁静和淡漠;她似乎太不推敲,太任凭自己的兴致和随意,只是自然地展开而从不制作。她甚至拒绝了创造,只是来自那偶然的风、偶然的雨、偶然发生的灵感,从而产生一种异常的诗美,一种祈祷式的平衡、纯净和静穆,没有半点令人不安和浮躁的成分,而在骨子里,却有一种原始的、未被侵蚀的生命力在涌动。真水无香,宁静的狂欢——这是我读于军二十多年诗歌历程始终如一的真切感受。

在 80 年代中期的陕西校园诗歌中,全晓锋的名头很是响亮,不仅和马永波、杨于军组成了交大核心主力,且与其他校园诗人及胡宽等校园外的先锋诗人交往甚洽,影响广泛。晓锋对现代诗的感觉十分到位,加之广博的阅读背景,眼界甚高,只有经典,没有凡人。如此有备而来,出手不凡。晓锋的诗内含朦胧诗的精神、第三代诗的语感,加上骨子里的浪漫主义气质,形成他特有的风格。收入本诗选的短诗《秋天的男人》和《石头》二诗,曾入选台湾九歌版《新诗三百首》,主编评之:“非常别致而充满透亮的新鲜之感。”“语言粗中带细,情绪的把握极有分寸,而寓意也极深澈。”组诗《献给我的孩子》至今读来依然是元气淋漓,荡气回肠,燃烧到骨头的深情热力和出人意料的奇绝意象合成史诗般的生命交响,为同类题材难得再有比肩的力作。可惜晓锋后来转而追求他的电影梦想去了,给喜欢他的诗友们留下不小的遗憾。

与交大校园诗人们同时活跃一时的王建民,来自青海,就读于当年的西北政法学院。本诗选入选诗人中惟有

两位我没有见过面,前述孙谦,再就是建民。对作为诗人的王建民,我实际上早已疏忘,可一旦诗友们提及他的作品、作品中那一种特殊的语感和情境,我立即会“回放”起当年的记忆与记忆中难以磨灭的感觉。“石头不做表情 / 水不流泪”(《水缠绕在嘛呢石上》)“爱人 歌唱你就得歌唱太阳 / 太阳有太阳的月亮 / 月亮有整整一年的夜晚 / 那么清凉 / 又无比漫长”(《歌唱》)“雪花一飘我就乱了 / 因为我身子里有个叫风的人 / 让风安生他就不是风了”“乘风行走的雪花 / 也是个有道理的人吧”(《雪花飘飞的理由》)这是至今仍不失“前卫”或曰“先锋”的、真正西部味的西部诗,现代意识加古歌情味,那一种返常合道、务虚于实的诡异劲道,如新开封的老酒,啥时喝来啥时为之一醉。

当代陕西先锋诗歌的第一个十年,在上述十五位诗人的合力打造下书写了浓墨重彩而精彩纷呈的辉煌一页。这期间,还应该有小宛、高铭两位女诗人的不凡表现,和岛子、赵琼两位重量级诗人的推波助澜。不无遗憾的是,或因远走他方联系不上或因个人委婉谢绝,无力全面展示而只能遗珠存念。

第二个十年的到来,由伊沙的北京归来而隆重揭幕。

诗选“辑五”五人,以伊沙、马非、朱剑“三剑客”为主,另选“冷箭”南嫫、“怪客”李岩,合成为横贯上世纪90年代陕西先锋诗歌的实力阵容。正是这一阵容的强势存在,陕西先锋诗歌方有了稳得住的重心、坐标和方向感而笑傲于整个中国诗坛。

至今犹记,第一次见到伊沙,是南嫫陪同一起到我家中聚叙,直觉中便感到这“家伙”是陕西不出外地也不产的“独门剑客”:目光如电,咄咄逼人;语出不凡,底气甚足。且对陕西以及“天下诗坛”了如指掌,显然是有备而来来则